焦點熱議

徐碧峰

誰最不願見到高鐵順利通車?

高鐵即將在22日舉行通車儀式，23日正式全線通車。這對香港整體發展而言，具有里程碑式意義。連日來市民排隊搶購高鐵票的熱烈情形，足以反映出高鐵的受歡迎程度以及在港人心目中的地位。但是，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反對派當初用盡一切辦法阻止「一地兩檢」，也必定會採取同樣手段去阻止高鐵通車順利進行，更何況還是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來臨之際，「反高鐵、助小麗」的競選策略必定會高調上演。可以預見的是，諸如「故意刁難內地工作人員」、「故意挑戰內地法律」、「故意找茬」等，都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裏出現，值得各界高度警惕，最不願見到高鐵順利通車的，就是反對派！

通車首日 必遭抹黑報道

實際上，《蘋果日報》等反中亂港媒體，連日來已在不斷製造新聞抹黑高鐵。先是捏造「實際行車時間不如普通鐵路」的所謂「新聞」，繼而在昨日在頭版刊出「高鐵賣飛七宗罪」的煽情「新聞」，將原本是通車前的售票系統運作小問題無限放大，該報意圖通過抹黑高鐵賣票問題進而否定整個高鐵，已經呼之欲出。當然，港鐵完全有責任完善相關工作，但高鐵的重大意義乃至眞實的便民利民絕不能被如此抹殺。

而從各方情況而知，反對派的一衆媒體，已經搶購到了數十張首日車票。這些媒體「搶票」絕沒有安什麼好心，不是去客觀報道高鐵的便捷與利民，而是要千方百計去「找茬」。網上有網民就一針見血地指出，「生果報記者係想睇高鐵出意外、出人命才開心」。可以預見到的是，屆時極有可能出現反對派故意製造事端以散布恐慌的情況，而次日的反對派媒體，必然會以極其負面的角度去攻擊抹黑高鐵。

至於其他的所謂「泛民」，極有可能故意身穿有政治口號的衣物，故意闖關，以圖製造「內地公安抓香港人」的所謂「事件」。總而言之，高鐵正式通車，「泛民」是極其不願意見到的，他們必須製造事端才能達到轉移公衆視線的目的，也只有這樣，才能減輕其反對高鐵「一地兩檢」的不光彩歷史。

除此外，抹黑高鐵還有另一重政治考慮。一如市民所知，政府已經刊登憲報，九龍西補選的提名期將從10月2日開始，這與23日的正式通車時間非常接近。當中有三個反對派需要操作的問題。第一，如何利用高鐵通車為手段，去主導整場補選的走向？第二，如何通過抹黑高鐵，從而達到抹黑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目的？第三，如何通過負面宣傳，從而達到替劉小麗助選的目的？

因此，「反高鐵」或「抹黑高鐵」、「破壞順利通車」，背後有着反對派未來發展空間的長遠思考。

實際上，劉小麗目前選情不樂觀。

首先，儘管已經通過各種手段逼退了包括馮檢基在內的所有內部對手，但「反民主」的粗暴運作，反而引來強烈的選民質疑之聲，劉小麗不僅沒有得到任何便宜，反而破壞了自己多年來苦心營造的「小麗民主教室老師」的形象。

攻擊高鐵 小麗助選工程

其次，劉小麗雖然得到「泛民」大佬的「保薦」參選，但她身負嚴重的法律問題，包括多次揚言「推翻不義的政府」，以及大量的「自決」言論，更何況她已經被DQ過一次，總而言之，最終能否安全「入閘」是一個極大的問號。最後，劉小麗與李卓人組成的「小人替補組合」，本身形象就不倫不類，更缺乏有力的選舉議題，既不敢重蹈姚松炎主打「DQ悲情牌」的覆轍，意圖從民生角度切入又拿不出一個焦點議題。所以，高鐵通車、「一地兩檢」運作，就成了劉小麗乃至整個反對派操弄的核心議題。

廣深港高速鐵路全長140公里，其中香港段長26公里。香港段通車後，會連接總長現已超過20000公里的國家高鐵網絡，使來往香港與內地各大城市的時間大大縮短，既有助加強香港與內地各方面的連繫和民衆交流往來，並促進經貿、旅遊及專業服務的發展，帶來龐大的經濟與社會效益。因此，高鐵不單對香港的對外交通運輸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及作用，也能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，鞏固香港作爲區域樞紐的地位。

顯而易見，高鐵通車越順利，反對派就越不利；「一地兩檢」越成功，「泛民」就越失敗。總之，反對派是完全站在市民利益的對立面。在補選結束之前，高鐵必將成爲反對派集中攻擊的箭靶。市民需提高警惕，切勿墮入其設下的輿論陷阱。

「新冷戰」下香港的角色

學者論衡

陳文鴻

中美矛盾正在演變成「新冷戰」。與冷戰不同，那時是美蘇對抗，後期中國被利用來牽制蘇聯。「新冷戰」的關鍵矛盾並非單純的中美矛盾，還涉及俄美之爭、伊美之爭，印度更未必願意充當美國牽制中國的棋子。「新冷戰」的形勢錯綜複雜，遠勝冷戰時期，美國實力也大不如前，雖說拚死掙扎，破壞巨大，能量不如冷戰時期，破壞會是再衰三竭。從大的趨勢來看，「新冷戰」會給中國帶來頗大的麻煩和挑戰。可是「新冷戰」正推動世界走向多元化，突破大國壟斷的格局，中國堅持永遠不稱霸，提出「一帶一路」倡議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爲世界各國帶來新的、重大的發展機遇。同時亦有助中國抗衡美國的打壓，令發展踏上新台階。這是「新冷戰」在衝突矛盾之外帶來的新契機。

在這個大變局裏，香港應如何配合或應對呢？

一是世界再不是太平盛世，反而是至少今後幾年裏戰亂頻仍，國際秩序崩析瓦解，國與國的衝突或連帶衝擊相信是無日無之。世界經濟發展可以有大的周期規律，但當美國的「美國優先」變成蠻橫的無賴行爲，在貿易金融和軍事政治方面，都會不停地推出各種干預措施，打擊他國和國際的穩定，經濟周期規律便會不斷地受到干擾。在全球化緊密結合的國際經濟與社會裏，一處的變動與衝突很容易會滾雪球地向外擴張，加上美國的火上添油，或趁亂掠奪利益，局勢極易失控。特朗普連任下去，形勢更劣。即使他下台，美國極右勢力已成氣候，美國霸權主義的最後掙扎還會十分兇猛。冷戰及後冷戰的二十年所謂太平盛世已一去不返，「新冷戰」絕對會是衝突對抗不斷的時期。

二是中美矛盾，在中國堅持不屈服而還有發展，美國強弩之末的掙扎之間，必然會進一步惡化。從貿易層面會擴展至全經濟面，乃至政治、文化，或許美國不敢一戰。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後，中國已認清美國的嘴臉，不可能以澶淵之盟來屈從。

「新冷戰」的多元衝突，實際使中國有更大的條件和更強的政治決心與美國抗衡，從而連帶支持其他與美國鬥爭的國家，也以它們的抗爭可減輕美國對華的壓力。中美矛盾惡化，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便會備受壓抑。中國留學生的全面回國，反而是中國人才和科研發展的大機會，也減少資金外流的黑洞。中美關係大有可能變成當年的美蘇關係，差別只是美俄關係可能更爲惡劣，中俄關係卻成積極因素。

三是美國一定不會放過香港。「佔中」雖然失敗，特區政府亦依法遏制「港獨」，但美國搗亂香港的意圖不會終止。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，也是中國與國際連接合作的主要渠道。而美國和英國也長年累月在香港布下各種關係、資源條件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也高度依賴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體系，美國甚或是有條件可與中國在爭奪香港的實際控制權。中國政府絕不能讓美國有機可乘，中央政府定必要求特區政府貫徹履行維護國家安全、國家領土完整憲制責任，同時排除來自美國或第三國的干預滲透。

在「一國兩制」下，香港的高度自治也因而要重新調整，不能按港英時期的所謂「自治」標準一成不變，而是有所作爲地應對新的政治、經濟和其他挑戰。特別是在中美互相排斥，香港難免受池魚之累。香港可以怎樣應對呢？能否在中美矛盾中發揮特殊的作用呢？這都涉及香港的制度與政策創新，也可作「一國兩制」裏的制度對沖。

香港珠海學院「一帶一路」研究所所長

反對派的「假新聞抹黑工程」

香港政情

聞昱行

筆者早前撰文指出，近年來，隨着香港政治鬥爭越來越激烈，網絡、虛擬社群與自媒體興盛，新聞和評論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模糊了界線，遊走在新聞與評論之間的失實文章更能抓住讀者眼球。《立場新聞》這樣的網媒把新聞和評論都擺在一個版面，很難不令人懷疑就有意模糊界線。不懷好意的「評論」就是「假新聞工程」的一部分。

「朱凱廸式構陷」害港不淺

反對派最惡劣的假新聞，當數朱凱廸那種把有常識的人看來都毫不相干的事編織在一起的「朱凱廸式構陷」。如在西九故宮博物館爭議中，他把馬會贊助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，與所謂「馬會非法佔用體育學院的五十萬平方尺用地」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拉在一起，指責特區政府與馬會私相授受。他又聲稱，當年擔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的林鄭月娥主持「黑箱作業」會議，把此後林鄭和體院與馬會有關人士的正常升遷，說成是體院與馬會主事者及相關官員利益輸送。

「朱凱廸式構陷」聳人聽聞，但「陰謀論」太過分則脫離常識。更多的「假新聞」則隱秘得多：第一在細節上造假；第二則以「重複一百次等於眞理」的方式洗腦；第三則把兩件看起來有點關係的事，毫無根據地說成是因果關係。這些隱蔽的「假新聞」更容易讓人「上當」，潛移默化地灌輸錯誤。如果沒有金睛火眼，沒有對信息轟炸的免疫力，很容易被帶入誤區。

前特首梁振英是反對派的眼中釘，針對他的「假新聞」也特別多。這裏舉幾個例子。梁振英明明最用心反「港獨」，卻被反對派扣上「港獨之父」的帽子。反對派的邏輯是，在梁振英公開批評「港獨」後，在香港媒體有關「港獨」的報道與評論才多了起來；如果沒有梁振英批評「港獨」，「港獨」就不氾濫。這種說法是顚倒了因果關係。事實上，「港獨」什麼時候第一次被廣泛報道歷歷可查。2007年，港大民意調查「專家」鍾庭耀搞了一個「香港人認同感」調查，把「香港獨立」作爲選項，得出很多人支持「港獨」的記錄。報告一經公開就引起激烈爭議。此後，隨着右翼排外主義在年輕人中的興起，早在梁振英批評「港獨」前，已有幾種「港獨」理論在年輕人中廣泛傳播。《學苑》開宗明義地打出「香港獨立論」，正是其後果。梁振英當時如果不批評，荒謬的理論只會不斷發酵。豈可顚倒是非？

另一件「假新聞」就是所謂的UGL事件。事隔多年，反對派纏繞不休。筆者曾指出，一家當時新成立的網媒「打響頭炮」之作，就是有關梁振英的UGL股份部分股權易手的調查。文章寫道：「協議揭露梁振英答應出任UGL的推薦人及顧問，梁更簽名附註：「provided that such assistance does not create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.（相關協助不會構成利益衝突）」這裏的中文翻譯完全忽視了英文中的「provided」是「在……前提下」的意思。整句話應理解爲，梁振英認可協議書的前提是「相關協助不會構成利益衝突」。但新聞的中文翻譯則誤導，梁振英自己說這些協助不會構成利益衝突，意思和原文截然相反。如果沒有金睛火眼，一定會被細節造假蒙騙。

鍾劍華的誹謗案是另一個例子。他在兩篇文章中，有意無意地暗示梁振英和黑社會有關係。當中至少涉嫌誹謗的有兩句話。

第一：「2012年3月底梁振英先生當選特首後不久，便出現了他的競選團隊出席小桃園飯局一事。與會中有人有江湖背景……，梁振英先生直到今天對此又作出過什麼說明嗎？」事實是，梁振英陣營明明早就說明過了。就在此事發生後不久，時任梁振英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已澄清：事前不知何人會出席，也否認曾邀請「江湖背景」人士出席。梁振英本人也回應，否認認識該「江湖背景」人士。但鍾劍華等反對派就是繼續一千遍地重複「沒有說明」。

第二，2013年梁振英在天水圍出席諮詢會。鍾劍華說：「香港的最高領導人竟然需要江湖大佬出動其手足爲自己撐場」、「第一次政府高層領導要公然由江湖人物幫他們『維持秩序』」，並進一步認爲，這是「政府與江湖勢力公然合流」。這當然是很嚴重的指控，但它是否有事實支持呢？

鍾劍華稱，「我講了2013年8月11日發生在天水圍居民諮詢大會門外，有江湖人物及其門生出面維持秩序，追打示威者的事件，這是客觀的事實。」問題是，就算那些人眞是「江湖人物」，鍾劍華所謂的「維持秩序、追打示威者」也都只是主觀的陳述，客觀的陳述應是雙方在現場發生衝突。在這一點，鍾劍華已有暗渡陳倉之嫌。

問題最大的一句還是把梁振英出席與「江湖人物」出現這兩件同時發生在同一地點的事，說成是「政府要江湖人物幫助維持秩序」，進而指控「政府與江湖勢力公然合流」。這個「要」字強烈暗示了「江湖人物」出現在現場是政府的主動要求。這不正犯下了把兩件看起來有關係的事，說成是因果關係的邏輯錯誤嗎？事實上，從來沒有證據證明政府「要求江湖人物維持秩序」，梁振英也很快否認了這種指控。

鍾劍華缺乏基本常識

張達明爲鍾劍華辯護，說這是「合理推論」，而只要作者「眞誠相信」，就屬於「公允評論」。這裏不深入分析在法律意義上是否屬於「公允評論」。只需指出，只要在大學中學習過社會科學或經濟學的人，其老師都會在第一堂課上教如何分辨「correlation」（有關聯）與「casual」（因果關係）的區別，並會再三強調不可混淆。這簡直就是社會學科的ABC。

如果說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人犯這種錯誤，或許情有可原。但鍾劍華就是相關科目的大學教授，他自己難道不知道兩者的區別？因此，撇開在法律上「誹謗」是否成立的問題，至少從道德與社會責任方面，鍾劍華的文章也非常值得質疑。這不得不叫人懷疑，這是反對派的「假新聞抹黑工程」中的一部分。

資深評論員

議論風生

陳一丹

教育國際化的問題和誤解

過去半個世紀，世界各國對國際化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。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的統計，從1970年到2015年的45年間，全球留學生總量從80萬人增加到450萬人。2015年34個OECD成員國的大學新生中，有5.6%來自海外。

高等教育國際化，已經是一個規模上千億美元的產業。教育國際化出現新的趨勢，不再局限於高等教育領域。在中國，出現針對中小學生甚至幼稚園小朋友的線上語言教育平台，招聘美國教師遠道而來教授英語，解決過去中國英語教學受師資限制，以及重寫作、輕聽說的痛點。再如國際夏令營、一年期跨國交換生專案在中國的初、高中廣受歡迎。目前哈佛上海中心、耶魯北京中心、昆山杜克大學、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等一批國際教育合作專案在中國落地，對培養國際視野，促進人文交流，起到正面作用。

教育國際化的三重推手

首先，教育國際化的最強推動力，是經濟的全球化。1997年，全球貨物總出口額爲5.6萬億美元，2017年，這一數字增長3.2倍至17.9萬億美元。1997年，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總額0.46萬億美元，2017年這一數字增長3.3倍至1.86萬億美元。隨之而來的，是對國際化人才的巨大需求。

其次，教育開始出現跨地域體驗消費的趨勢。在教育領域，騰訊課堂作爲中國最大的職業教育線上平台，累積爲3億用戶提供了超過10萬門網路教育課程。通過線上學習，視障按摩師學會了英語交流、山區媽媽實現了室內設計師的夢想。現在，每天還有數以千計的美國教師通過互聯網與中國學生視頻連線。教育成爲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出超的重要來源。

第三，國際間的教育合作機制越來越靈活，內容越來越豐富。美國線上教育平台Coursera與包括清華、北大、東京大學、莫斯科理工在內的全球八百所大學達成合作，提供英語、中文、日文、俄文課程、和帶字幕的多語種教學課程。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學生數以百萬計，成爲美國本土之外最大的生源地。

然而，教育國際化的實際效果如何，沒有結論；二則，對教育國際化的理解局限在教書育人的範圍內，科研成果在國際間沒有能夠充分共用。

教育國際化的實際效果如何？有至少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述。一種認爲教育國際化讓優質教育資源在全球重新分配，使得來自不發達國家的學生也有了享受一流教育的機會。另一種觀點認爲，學生的跨境流動實際上導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「人才虹吸」，優秀的畢業生向先進國家集中，後進國家留不住自己最聰明的子弟，製造新的不公平。由於研究不夠充分，只有爭論沒有結論，成爲教育國際化進程中需要繼續考察的課題。

培養國際化人才是教育國際化的目標之一，但非全部。根據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（NSF）的統計，2016年全球發表的所有科技論文中，21.7%的作者來自不同國家。根據OECD的統計，2015年成員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畢業生中26%是國際學生，保證大學的科研成果是全球共用公共產品。

國際化沒有改變教育向善的理念、沒有改變需要尊重教育本身規律、沒有改變增進不同族群互相包容了解的出發點。從多角度研究教育國際化的影響，是消除偏見和誤解的第一步。

我看到各國教育機構對教學和科研的不同做法。例如美國的通識教育、德國的學徒制、英國高校與社區的和諧關係。這些寶貴的財富啓發我思考，對促進國際間教育合作上，大致可以有兩個方向，第一是增進了解。這些在不同國情下發展出來的模式，是教育國際合作優勢互補的基礎。第二是促進分享，讓好的經驗，好的研究成果在國際間推廣普及。

增進了解推廣成功經驗

朝向這兩個方向，我和團隊做了兩件事情。一是成立「一丹獎」，鼓勵針對教育本身的研究和實踐。2017年的「一丹獎」分別頒給了提出「成長型心態」的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Carol Dweck，以及致力於改變貧困鄉村教育的哥倫比亞新學校基金會創始人Vicky Colbert。這兩位傑出女性對教育的貢獻，被應用於多個國家並皆取得效果。新一期的「一丹獎」評選已經啓動。相信未來「一丹獎」會成爲推動國際間教育合作、推廣優秀的教育科研和實踐成果全球推廣的重要平台。

第二件事，是在推出「一丹獎」的同時，與經濟學人信息社（EIU）合作推出「全球教育未來指數」（WEFFI）。去年發布的第一期「全球教育未來指數」從政策、教學環境、社會經濟狀況三個方面，衡量全球35個主要經濟體的教育體系，應對未來科技和人才市場需求挑戰的能力。這35個經濟體佔全球人口總數的77%、全球GDP總量的88%。

評估的結果暴露出一些普遍性問題，比如教育投入的不足、對教師支持的不夠、教育政策執行不力。即便是諸多有發達大國印象的教育強國，實際情況也不樂觀。新一期的「全球教育未來指數」正在編製中，範圍擴大至50個國家和地區，代表全球93%的GDP。在國際間建立針對年輕人、針對未來的教育「標杆」，目的是促進國際間教育的互相了解與合作進步。

教育國際化是一個宏大的命題。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，一丹獎、全球未來教育指數則是在這一宏大命題下的新鮮嘗試，希望對增強理解、促進交流起到積極作用，對辦好教育這一千年大計有所幫助和啓發。

騰訊主要創始人、一丹獎創辦人